

结 论

《蒙古族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一个开拓性的课题，古今中外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正由于这样，其难度较大。首先是资料缺乏，其二是没有经验，其三无专门人才。面对这种情况，只能对现有资料进行挖掘，边干边学，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才，提高能力，适应要求，完成这项科研任务。开展这一课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探索蒙古族社会经济和经济思想发展规律，掌握和运用规律，使蒙古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对《蒙古族经济思想史研究》这一课题，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和蒙古族的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在搜集整理大量历史资料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进行编写。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我们研究蒙古族经济思想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82、8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必须坚持这些基本原理。首先要研究蒙古族社会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然后才能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并且还要研究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

蒙古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一个重要成员，以英勇勤劳著称于世，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祖国和人类的社会发展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其民族的起源，从拉施特主编的《史集》中所述：“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路，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一昆。”^①同一书中还讲述：“当这个民族在这些山里和森林里生息繁衍，他们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他们就互相商量，有什么好办法和不难做到的办法，可使他们走出这个严寒的峡谷和狭窄的山道。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产地。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准备了许多木柴和煤，宰杀了七十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整张的皮，用那些皮做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脚下堆起木柴和煤，安置就绪，使这七十个风箱一齐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结果，从那里获得了无数的铁，同时，通道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

^①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251、252页，商务印书馆，1983。

野上。”

按照拉施特在《史集》中提出的年代，即在公元 13 世纪再往前两千年前，也就是中国历史的西周时期，约于公元前 700 余年。我国许多史学家认为蒙古族来源于东胡。司马迁著《史记》中多次提到东胡的活动，而其所叙东胡活动的事迹在时间上可上溯至公元前 7 世纪中期。东胡人最早活动的地区在今内蒙古东部。东胡兴起于公元前 3 世纪，即战国末期，与匈奴并存，为当时两个强大的部落。在公元 206 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部众逃散，主要两支逃往乌桓山与鲜卑山，从此便出现了乌桓族与鲜卑族，后来又分出许多部落，到唐末五代十国出现室韦，辽、金时兴起的蒙古，都属于东胡的一系。据我国史书记载蒙古族来源于室韦或蒙兀室韦，最早是《魏书》中记载的“失韦传”，以后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里对室韦有专门记载。特别在《旧唐书》中提到“蒙兀室韦”，“望建河从其河源经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蒙兀室韦”。^②“望建河即今之额尔古纳河，俱轮泊即呼伦湖”。^③这些记载都是有关蒙古族先民在公元 6 世纪至 8 世纪下叶以前活动的地域。据《蒙古秘史》开篇的记载：“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和妻子豁埃马阑勒一同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这个时间是在公元 8 世纪下叶，即以孛儿帖赤那为首的若干部西迁到克鲁伦河、斡难河、土拉河的发源地——不儿罕合刺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 1 卷，第 1 分册，251、252 页，商务印书馆，1983。

^② 《旧唐书·北狄传》，64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徐占江主编：《呼伦湖志》，12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敦山一带居住。也就是蒙古史上的，蒙古人从额儿古涅一昆（今额尔古纳河）出走的西迁。这个记载与拉施特的《史记》中的传说是一致的，与我国的一些史书记载是吻合的。

蒙古人在公元 5 世纪前是靠森林和大河哺育，其生产与生活已走完原始社会早期历史阶段，而跨入了拥有原始种植业和原始畜牧业经济的原始社会中期阶段。公元 5 至 8 世纪时，蒙古人已有明显的畜牧业从种植业中分离出来的迹象，已向发展畜牧业经济方面转变；同时，以种植业或渔猎经济难以谋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因而也必须发展新的生产力，必然促使向畜牧业经济过渡。从《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当时蒙古人只是“养猪”、“少马”、“无羊”。马已能役使；“有牛不用”、“巨豕食之”。到 8 世纪初畜牧业虽有一定发展，但还不很发达，农业也很落后，当时处于“剡木为犁，人挽以耕，田获甚褊”的原始状态。从 9 世纪才由原始社会步入奴隶制社会，12 世纪以后畜牧业就有了明显的发展，手工业也较发达，与内地、西夏、畏吾儿等的贸易也较频繁。蒙古人中也有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已经使用铁制农具，尤其在制造武器方面显著发达。但在这时蒙古草原地区出现了各部落首领之间的争夺奴隶和部属之战，互相攻击，即《蒙古秘史》中描述的“星天旋转，诸国争战……”的混乱局面。而且金王朝对蒙古地区进行长年掠夺和剥削，还实行对蒙古人的减丁政策。这时蒙古草原上的广大奴隶、自由民和部分力量薄弱的奴隶主都希望和平、安定和统一，既结束内乱，又能加强团结抵抗金国的侵略。成吉思汗（铁木真）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成吉思汗面对蒙古草原上的这种复杂形势，少年时期因父亲

也速该把阿秃儿（蒙古部的首领）于 1171 年被塔塔儿人害死，其部属纷纷逃散，并遭其他部落的多种迫害，经过艰苦斗争和努力，开始利用王罕、札木合等势力；同时组织聚集了部众，适应了奴隶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要求，收容了一些逃亡和暴动的奴隶，吸收了一些冲破氏族纽带而脱离氏族的自由民和拥有一定的私有经济能提供赋税的居民，有的成为他的那可儿（伴当），代表着一些改革派首领的利益，从而团结和组织了这些力量，先后战胜了草原上各部的奴隶主，统一草原各部，于公元 1206 年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建成了蒙古汗国。在蒙古汗国建立以后，对外进行了三次西征，在国内相继续统一了各个对立的政权（吐蕃、大理、南宋、辽、金、西夏），并建立了四大汗国，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实现全国大一统，使中国历史发展到空前强盛时期。概括元朝做出了七大贡献，其中包括：（一）七个政权统一起来；（二）奠定了中国当今的版图；（三）全面发展了全国经济，特别是以农业为主，大量在边疆地区屯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四）开拓了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对外贸易；（五）修筑运河和道路，广设水陆驿站，畅通欧亚；（六）在世界上是最早于全国通用纸币的国家，比欧美要早二百年或四百年；（七）促进了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虽然元朝在全国的统治不足百年，但它所创造的伟业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空前的，震撼了世界，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具有极其重大深远的意义。直至今日成吉思汗仍被推崇为世界历史上在 13 世纪居于首位的伟人。他的思想与伟业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创造了具有特色的东方游牧文明。他与忽必烈等人为这一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有些基本内容已被肯定

下来，并且不断地在继承和发扬。

我们研究《蒙古秘史》中的经济思想，可以看到蒙古族在公元 8 世纪下叶到 13 世纪下叶约五百年时间，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游牧式的畜牧业。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斗争是围绕着蒙古高原上的土地（即草场、牧地、营盘）、牲畜和奴隶的占有，社会制度已由原始氏族制瓦解处于奴隶制的阶段，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尤其是实行领户分封（即千户制）之后，蒙古族已由奴隶制向军事封建制转变。而“千户制”则是政治、军事、经济三统一的社会组织和政权形式，蒙古汗国就是在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及九十五个千户的统治下，形成一个新型的国家。《蒙古秘史》中论述了以游牧式的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基础，同时论述了当时的商业（包括对外贸易）、手工业、农业、交通（驿站）等经济发展的状况，所以说，《蒙古秘史》中的经济思想，是蒙古族游牧社会的轮廓介绍，也是给人们展示了一幅蒙古族建立的游牧文明的基本图景。成吉思汗的经济思想在《蒙古秘史》中，有了较全面的论述，当然在其他一些著作中给予了不同侧面的补充和深入，但基本的思想内容可以清楚看出，我们给予的概括是：“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社会经济基础，从当时蒙古汗国发展战略考虑，相应地发展商业（包括对外贸易）、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主要是驿站）。”根据他的经济思想，同时在政权建设（千户制），对商人、工匠实行的保护政策，以及对五种宗教采取“兼蓄并用”，并在“大札撒”中规定下来，这是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提出了“足有所踏，手有所置”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继承祖业，能使属民安居乐业，临终前自己概括了一生做了四件好事，与其

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实际上在他执政的 12 年中确实是按其目标实践的，继续推进了成吉思汗的遗愿，特别在进行西征和伐金过程中，执行了成吉思汗临终遗嘱，使已经形成的蒙古大帝国有了一定的发展。蒙哥即汗位是处在“黄金家族”内部争夺汗位比较激化的情况下取得的，特别是四大汗国之间已处于明显的分裂状态，由于得到拔都等人的大力扶持推荐才使蒙哥登上了大汗的位置。面对这种复杂情况，蒙哥不仅在政治上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处理了一些分裂势力，在经济上坚持了合理理财的原则，尤其坚持廉政的措施，对当时皇族的腐败和挥霍给予打击和控制，虽然遭到很大的反对与压力，但他坚持正确理财和廉政思想，适应了当时巩固政权和社会稳定发展的要求，以及在赋税征收方面的一些改革，对促进社会的发展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元朝忽必烈在全国大一统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政治上击败阿里不哥之后，主要精力集中于巩固元朝的统治。他在政治上是采用汉法，实行“鼎新革故，务一万方”的原则，经济上确定了全国的基本方针是“农业为基础，商业为主导，因地制宜，各业并举”。其经济思想体系的实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功利主义，并且是吸取了汉族历代统治者的“理财助国”思想，虽然元朝是以蒙古族统治者为主，但它是各族封建统治者的代表，其本质都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忽必烈经济思想中重要的内容是“因地制宜与各业并举”如对蒙古族根据地——岭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视蒙古族的传统经济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元朝专门设置了 14 个官马道，当时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而对岭北行省主要经济部门发生灾害时，从中原调拨大量物资和中央政府给予银钞等“赈济”，特别是畜

牧业经济遭到自然灾害后给予及时赈济。对畜牧场的生产设备条件、养畜技术、管理人员以及马政的规定都给予优越的照顾。此外，在城市建设方面除大都（现在的北京）为元朝的首都外，上都是忽必烈在即位前就进行建设的一个重点地区，即位后上都是蒙古族统治者的夏都，是皇帝每年北巡避暑之地，而且这里是元朝政权同北部各汗国联系沟通的重地，不仅具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并在商业（包括外贸）、手工业方面也是非常繁荣的。上都是蒙古族统治者在北方地区新建的一座重要城市。当时中外商人、使节、旅行家都来上都进行通商、文化交流和观光，是元朝极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上都的交通在当时也是比较发达的。忽必烈的经济思想是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发展要求的，所以，出现了数十年的空前发展的盛世，其经济发展之规模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许多方面超过了秦、汉、隋、唐。有些史学家认为元朝是我国经济的倒退和濒临崩溃边缘的时期，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史实的，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发展时期。元朝经济与以前历代封建统治是有一些共性的，由于其剥削阶级本性和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其中还包括民族间的不平等，特别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藩王之乱和对周围邻国进行穷兵黩武的侵略因此给元朝的财政造成很大损失以及封建王朝后来的日趋腐败所以元朝在全中国的统治不足百年终因农民起义而走向覆灭，元顺帝及其政权退出中原又回到大漠的草原。

元朝在全国的统治近百年，除忽必烈以外，我们对察必皇后的“分民定业论”及其在宫廷内提倡勤劳节俭的有关经济思想，以及对忽必烈决策发挥的一定作用进行了研究。同时，还对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重农观念、消费崇俭、保护劳动力、整顿

钞法、推行“经理法”、重视民生的思想；对英宗（硕德八剌）重视发展畜牧业、实行农牧并举、平均徭役的思想；对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经济思想及其失败原因；对拜住的薄敛民足、重视民生和对赋税负担考虑承受力的思想……都进行了研究。这些人的经济思想对元朝统治的巩固和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如元顺帝虽然其在位时失去了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但究其根本原因绝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元朝统治由来已久的弊端发展的必然结果，如在他即位后，由于对贵族、官僚滥行赏赐和宫廷的挥霍浪费，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他采取了一些挽救措施，但类似此种制度已是根深蒂固，历代都实行大量赏赐的做法，所以，到元顺帝时也无法改变。诸如此类的统治者的腐败行为，长久发展必然导致灭亡。

北元时期是蒙古族一个重大变革的时期，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尽其一切所能企求实现“黄金家族”统治权的复兴。他（她）们面对元朝退出对全国的统治和明朝对蒙古地区的征服，特别是蒙古社会内部的分裂割据和战争，为了维护“黄金家族”汗权的统一，重点是把各部统一起来，先后征讨了永谢布、瓦剌、兀良哈、土默特等部；然后，对当时的封建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如撤销了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三个机构，废除了太师、丞相、知院、御史台等职，提高了济农的地位，即任命长子担任此职。他把原有领主的领地进行了重新整顿和划分，把蒙古地区重新划分为六个万户（即兀鲁思）。这六个万户又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即察哈尔、兀良哈、喀尔喀三个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辖，住帐于察哈尔万户；右翼三万户即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三个万户，住帐于鄂尔多斯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统

辖。达延汗对兀良哈地区和卫拉特诸部，沿袭历史成规，用联姻、结盟等方式加以笼络，确立自己的宗主权。由于达延汗的这种改革措施，使元朝退出全国统治后蒙古各部近百年的相互割据与战争结束，出现了暂时稳定与复兴的北元政局。在此期间，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对内主要采取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措施，建立和完善适合蒙古草原的经济基础。重新划分封建领主的势力范围，主要是牧场和属民，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的整体化和有序化，而且适应当时统一战争的需要，采取了比较集中地发展“大畜牧业”的经营方式，特别是大小领主拥有越来越多的牲畜，有的大领主拥有几十万头牲畜，最多者可达“马四十万匹，骆驼、牛、羊以百万数”^①。在北元初期，由于明朝对蒙古地区的征讨和封锁，蒙古族为了生存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这时坚持发展畜牧业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为了生存，对日常生产与生活必需的手工业发展也非常重视，从当时作战、生产（包括狩猎）和生活的需要，对一些生产的工具、生活的用具和作战的武器，主要靠蒙古地区的工匠自行生产和制作。这时，在蒙古地区还有部分属民从事狩猎、渔业和种植业。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在同明朝的关系上，尽力采取和平友好的政策，尤其在“土木之变”后，达延汗遣使明朝“举书求贡”，得到明朝同意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通贡关系。通过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不仅解决了当时一些封建贵族的奢侈品的需要，而且使广大的蒙古族劳动人民生产与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并且因明朝开放了一些边口，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蒙古族简史》，第1版，16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往，对农业与畜牧业发展都带来了有利的促进。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的这些经济思想，为其孙子阿勒坦汗继续贯彻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阿勒坦汗（又称俺达汗）执政期间，继续坚持了与明朝的通贡互市的政策与发展蒙古地区经济的思想。他与明朝的关系上，尽力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达到通贡互市目的。虽然初期也先曾采用武力方法迫使明朝通贡，然而实践证明以和平方式达到通贡互市目的更对蒙汉人民有利，甚至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实行依法互市。阿勒坦汗与明朝相继保持了数十年相互和平发展时期，对蒙汉人民的交往和满足蒙古地区生产与生活的需要都起了相互促进的良好作用。这时蒙古地区的农业也有较明显的发展，与阿勒坦汗对农业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其中，农业发展较迅速和成效显著的是土默特地区。此外，阿勒坦汗很重视手工业的发展。他在与明朝通贡互市时购买一些手工业商品，同时重视招贤纳士，广募手工人才。甚至采取派人到内地去招纳一些手工艺人来到土默特，并运用一些优待手工艺人的做法来吸引。另外，阿勒坦汗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俗称“阿勒坦汗法”，核心是维护私有制，特别是封建领主的私有财产，包括严惩盗窃、处罚破坏经济秩序、奖励保护私人财产等。这些都属于阿勒坦汗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反映了北元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发展的客观要求。

北元后期蒙古地区又处于各部间的分裂与混战的局面，即在公元 17 世纪初，这时东北的女真族兴起，由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对蒙古采取的是武力征服和政治招抚的两手策略。前 30 年使蒙古的科尔沁

等部归附后金，大清帝国建立后，又陆续使喀尔喀部归附清朝，并进一步对卫拉特部征讨，其中对准噶尔部进行了较长时期的战争，由康熙经雍正到乾隆才将准噶尔部征服，继而征服了青海的和硕特部，直到 18 世纪中叶蒙古部政权最终统一于清朝。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概述，而重点阐述了《卫拉特法典》中的经济思想，准噶尔汗国成立的经济原因，噶尔丹的经济思想、策旺阿喇布汗与噶尔丹策零汗时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清朝统治的后期，着重介绍了松筠的《西陲总统事略》及其经济思想和裕谦的经济思想。根据有关史料，这两位蒙古族的人物不仅为清王朝服务，而且对蒙古族的经济思想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清王朝统一政权下为蒙古族的经济发展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到清朝后期，旅蒙商的进入蒙古地区，既有积极的促进经济发展、有利王公贵族和人民群众需要商品得到满足的一面，又有对蒙古地区广大人民残酷剥削的一面，对其利弊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

蒙古族在进入鸦片战争之后，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并且还遭受大民族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整个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们对蒙古地区社会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对畜牧业、农业（特别是放垦）带来的影响，资本主义工矿实业的出现，蒙古族的思想家花沙纳提出的货币改革、锡良提出的建设主权论、贡桑诺尔布提出的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一系列变革维新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对近代蒙古族一位重要思想家罗布桑却丹，也进行了研究。罗布桑却丹主要是受西方和日本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面对中国的落后，特别是对蒙古地区的贫困落后，撰写了一部《蒙古风俗鉴》；还提出过许多发展民族文化、

民族经济和振兴民族的建议和方案，虽然当时未能得到采纳和实施，但他在《蒙古风俗鉴》中的丰富哲学、经济及民俗等方面的思想，却对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的许多建议与方案虽未被采纳，然而，其中进步的民主革命与先进经济思想被社会实践证实是正确的。比如，他对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提出过采用外国的先进饲养方法，改变蒙古地区落后的饲养方法，这是完全正确的。此外，他提出应改革蒙旗所实行的名目繁多的赋税与差役，主张轻徭薄赋。还提出要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使蒙古民族能富强自立，并且认为振兴民族经济首要任务是发展民族教育，要正确吸收先进地区文化来促进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经济发展和富强。他认为蒙古地区大量人口当喇嘛是贫困愚昧的重要根源之一，把人口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是一致的，只有人民达到了富足，则可以延长寿命，增加人口。罗布桑却丹的经济思想在民主革命初期，在蒙古民族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我们还对几名王公贵族提出的创办实业公司的经济思潮、部分农牧民起义中提出反封建的经济口号，以及近代蒙古族经济思想发展趋势等，作了一些分析和论述。

“五四”运动后，我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经济上进行反封建反殖民化的斗争，蒙古族有些进步的思想家，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提出对蒙古地区进行改革和维新，尤其是在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的反对“三大敌人”的斗争，经过几十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特别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的民族自治区，历时 50 余年的发展内蒙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我们着重论述了乌兰夫的经济思想。乌兰夫的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各民族的实际，特别是他在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能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时因地制宜地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运用指导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从而使内蒙古自治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能够顺利和迅速地进行与发展，保证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在此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畜牧业、农业、工业、商业、交通、手工业及财政金融等各条战线，都是创造性地执行了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获得全国第一个模范自治区的光荣称号。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五十年各项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归功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正确贯彻实施，归功于内蒙古党委历届领导班子的集体思想的正确，其中也包括乌兰夫等蒙古族及其他民族同志的正确经济思想所发挥的作用。此外在全国相继成立的三个蒙古族自治州和八个蒙古族自治县，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指引下，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与蒙古族由传统经济思想转变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是紧密相连的。

当我们将对蒙古族的社会经济与一些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之后，应该明确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许多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失了，有的民族被其他民族所融合，而蒙古族不仅在 13 世纪崛起之后建立了横跨欧

亚的大帝国，对我国北方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元朝以后虽然退出了对全国的统治，但始终作为祖国的重要成员继续活动于历史舞台，包括北元、清朝、民国和伪满时期，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伟大的民族为什么能够生存发展过来呢？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各个领域创造了哪些历史文化？并使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需要再作进一步分析：

一、蒙古高原的自然条件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蒙古高原位于亚洲东部，在地球上是从东经 90 度到 120 度，北纬 40 度到 50 度之间，总面积约为 300 余万平方公里。东有大兴安岭山脉，西有阿尔泰山脉，南为阴山山脉，北为肯特山山脉。平均海拔在 1500 米左右，最高的山海拔达 3000 余米。山脉之间形成内陆河流、湖泊与盆地。这里的绿地分布于山脉两麓近河湖地域，沙漠面积占该地理单元面积的 30% 以上，主要分布在东南部。这里的气候属于大陆性草原，但在大漠南北有些差异。漠北温差昼夜变化悬殊，夏短冬长，全年有二分之一时间是在高气压笼罩之下，漠南稍好一些，但受西伯利亚寒潮影响，气温也不稳定。全地区无霜期较短，一般为 90—120 天，降雨量少，年平均在 120 毫米至 250 毫米，所以，总的气候干燥和较寒冷。由于其地理与气候条件限制，虽然这里有茂密的森林，丰富的地下矿藏和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科尔沁三大草原，但自古以来，蒙古族及其他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经历了采集、渔捞、狩猎、种植、家畜饲养等多种生产方式的探索 and 选择，终于坚持以游牧式的畜牧业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其他生产只是相应地有了一定的发

展。我们认为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然条件不是绝对的决定因素，但应承认在过去的几千年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仍然受着自然条件的客观限制，只有在科学技术极大发展作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的现代条件下，人们才能较高程度地减少自然条件的制约，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所以，古往今来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有以农耕为主的城国和以游牧式畜牧业为主的行国之间的差异，主要就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客观限制而促成的。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所指出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蒙古族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客观差异是存在的，我们研究人类和蒙古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思想变化规律，应该承认和尊重这个客观的事实。

二、土地所有制问题。从《蒙古秘史》中可以看出，在公元 8 世纪下叶蒙古族是处在奴隶制社会，当时的土地所有制是部落奴隶主所有制，到成吉思汗实行领户分封制（千户制）以后，土地所有制则发生了变化。这种制度源于公元前 3 世纪的匈奴，当时匈奴的冒顿单于实力强盛，他将所属的骑兵部队组成 24 个万骑，“万骑之下设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由此组成了匈奴奴隶制社会完整的统治体系”。^② 这时匈奴的主要社会经济基础是游牧式的畜牧业。而成吉思汗的领户分封制（即千户制）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的。成吉思汗的领户分封制是在实现了蒙古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2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② 《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第 1 版，8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部的统一，并建立蒙古汗国后，对其“黄金家族”成员及其功臣进行的分封。全国封了 4 个万户，95 个千户。他的领户分封制，“是把各部的牧户编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并设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万户长和千户长由大汗直接封任。万户长及千户长，按其等级高低，领有一定范围的大小不同的疆域作为封地，并领有封地内数量不等的封户，成为或大或小的封建领主。领户内的劳动人民，不论原先的社会身份是奴隶、自由民或是属民，都一律用封建法制把他们强制地固定在一定的封区之内，接受该封区领主的‘合法’的剥削与奴役。这些牧民在领主指定的牧地，平时要定期向领主服役、纳贡，战时要自备鞍马、兵器和粮食随从领主出征，履行兵役义务”。^①成吉思汗的领户分封制（即千户制）是军事、行政、生产三结合的组织，是国家的政权形式，这种组织是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当时游牧式畜牧业为主要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根据 13 世纪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经历了相互争夺土地（草场、营盘）、牲畜与属民（主要是奴隶）的一系列战争，普遍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政权和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成吉思汗所建立的三合一的千户制就适应了这种要求。在这种三合一的统一政权组织形式下，将全国的土地、牲畜和属民（劳动力、战斗力）都集中组织与严密地管理起来，也是为适应当时统一中国和向欧亚征战的需要。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成吉思汗在进行领户分封时，为维护其统治和保卫大汗建立了怯薛军，这使千户制更加完善与巩固。这种制度在蒙古汗国时发挥了极重要作用。到了元朝

林干著：《东胡史》，227、228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